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日本文化史研究

〔日〕内藤湖南 著

海外  
借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日本文化史研究

〔日〕内藤湖南 著

刘克申 译

商务印书馆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化史研究/(日)内藤湖南著;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6532-7

I. ①日… II. ①内… ②刘… III. ①文化史—研究—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5246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日本文化史研究

〔日〕内藤湖南 著

刘克申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532-7

---

2018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张

定价:48.00元

Naito Torajiro

**NIHON BUNKASHI KENKYU**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悉,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6 年年底已先后分十五辑印行名著 65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六辑、十七辑,到 2018 年年底出版至 7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8 年 4 月

## 译 序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之物。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已经证实，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早在他们的民族形成时期就已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创造。日本文化是在日本列岛的自然风土中萌发的，尽管后来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大陆（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但就其本质而言，日本文化仍然是一种自发生成的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的原始神道。原始神道是在日本列岛的自然风土中孕育出来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祖先崇拜和各种祭祀活动，与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咒语、歌谣、祝词、神话、传说乃至后来人们所说的言灵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体现了日本民族固有的本土思想。日本民族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尤其是古代中国文化，为了吸收、消化这些外来文化，使其能够契合日本的风土，日本民族做出了不可尽数、坚韧不拔的努力。外来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的融合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冲突到调和、融入，几经波折，反反复复，日本人的思想价值体系中的许多重大建构，如神佛融合、儒学日本化、老庄思想变异、禅宗世俗化，无一不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在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同

时,日本民族仍不断地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创造,文学方面的和歌、俳句、物语、浮世草子等,戏曲方面的谣曲、狂言、能乐、净琉璃、歌舞伎等,绘画方面的大和绘、浮世绘等,这些文化成果无一不具有独特的日本民族特色。日本文化孕育于日本列岛的自然风土,伴随着日本民族的成长而发展,必然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外来的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对它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但这些都不曾,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文化固有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也就导致产生了日本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日本人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中很早就对这种文化差异性予以了关注。平安时代,菅原道真最早提出来的所谓“和魂汉才”不仅仅是主张日本本土文化精神的固守,其中也包含着对日本文化与外来的大陆文化即“和”与“汉”的差异性的自觉。日本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无论对大陆文化的吸收、消化,还是对西方文化的受容、变容,“和魂”始终如影随形,消长与共。

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是“和魂”的积极倡导者,本居宣长主张“清除汉意,坚固和魂”,他强烈批判日本在大陆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养成的崇拜中国文化的“唐心”,主张要从古道,特别是万叶世界中去寻找“大和心”,他认为这种“大和心”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清净之心”,也是日本人的传统精神之源。本居宣长鼓吹一种自己的国家所特有的品性,强调日本文化的特异性,本居宣长可以说开了后来所谓的“日本文化论”的先河。

明治维新是日本结束长期锁国状态之后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明治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吸收近代西方文明,使日本成为西方式的现代化国家。先进

的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传入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巨变使日本人意识到日本与西方的差异。在弥漫着全面欧化的时代氛围中,一些文化人开始批判日本人对西方的过度崇拜,提出汲取西方的文明开化精神,将其“同化”于日本,同时还应该保持自己的国粹。从“和魂汉才”转为“和魂洋才”,时代在变化,但对民族精神的固守一如既往。所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探寻日本文化的特质和日本人的国民性形成了一股潮流,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内藤湖南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日本文化的文章。作为一位中国史学的大家,内藤湖南此时在日本已有相当的学术声望,其以独特的视角对日本文化的论述引起了广泛关注。1924年,也就是大正时代尾期,内藤湖南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名之以《日本文化史研究》由京都弘文堂出版。此书甫出,反映强烈,好评如潮,尔后一版再版,现已被公认为日本文化论的名著。

内藤湖南(1866—1934年),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出生于秋田县鹿角郡毛马内町的一个武士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有一定的汉学教养。内藤湖南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早年做过小学教师,后前往东京、大阪,担任过《朝日新闻》以及《明教新志》《日本人》杂志的记者、编辑和评论员。在此期间,他曾先后为松方正义、大隈重信内阁起草过内阁政纲。1897年,内藤湖南赴台湾,担任《台湾日报》主笔,翌年又担任《万朝报》特约评论员。内藤湖南对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从历史学家的视角都做过深刻的观察并写出大量时评文章,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乃至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一定



影响。年近四十岁时,内藤湖南从新闻界转入京都大学。内藤湖南并非科班出身,没有大学文凭而被京都大学聘为东洋史学科教职人员,之后又成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这在京都大学是没有先例的。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主持“东洋史学”第一讲座达20年之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内藤湖南学识渊博,汉学功底扎实,从中国上古史至民国史,都有著述,其学说多有独创之见且自成体系,故有“内藤史学”之称,本人亦成为名驰遐迩的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因其对中国古代史的独创性研究成果如“中国史三分法”理论,尤其是“宋代近世学说”受到中日两国史学界瞩目。内藤湖南学术研究范围极广,其一生治学,以史学最为专精,著述丰赡,又旁及经学、佛学、博物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文字学、敦煌学、民族学、目录学、艺术史等众多领域,且皆有建树,这在学术界极为罕见。日本筑摩书房出版的《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收入了他的绝大部分著述。内藤湖南曾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记者派驻中国,其前后九次到过中国,我国学术界名流如刘鹗、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张元济、方药雨、郑孝胥、胡适等都与其有过交往,切磋学术,诗文酬酢。

在内藤湖南的日本文化研究中,他始终把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探寻中日文化的关系也是其一生的学术追求。内藤湖南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为古老的文化,但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两者的关系,内藤湖南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他认为,日本文化如同磨成的豆浆,依靠中国文化的卤水才凝集而成豆腐。在内藤湖南看来,日本文化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日本

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内藤湖南的这个比喻不无可推敲之处,但他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的观点可以说是点到了日本文化的命门。在各种民族文化的研究中,文化的发生、发展的条件各有所异,其过程也不尽相同。对于日本文化研究而言,地理历史上的渊源使中国及其文化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如果想要绕开中国及其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就无从谈起。文化是一个含义极其宽泛、庞杂的概念,可以涵括各种各样的领域,也正因如此,对于个体研究者来说,能将社会、政治、历史、艺术、宗教等众多学科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并能在其间舒拳展袖,游刃有余,如果没有淹贯古今的学问根柢是难以为任的。以本书所收篇目涉猎领域之广阔,不难看出作者高远的学术视阈,而对各篇目细加研读,其对问题切入之准确,论述之精详,更可感知作者深厚的学殖。

本书的开篇是《日本远古时代的状态》,文章在描述远古时期日本列岛上的社会状态的同时,论述了那一时期日本与大陆中国的关系。尚处于部落生活的日本列岛上的土著民族在形成统一的国家之前,已经同大陆中国有着相当频繁的交往。当时的历史遗留物诸如铜镜、铜铎、铜铎、货泉、玉器乃至丝绸在各地的发现可以印证从战国末期至东汉时期,中国文化已影响日本,且不止于沿海地区,后来传布至日本的内地。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关于金印缘何在远离政权中心的筑前志贺岛发现以及相关的问题曾引起很多争论。通过把自身掌握的材料与历史的分析融为一体,内藤推导出一个使人心悦诚服的论断,彰显了历史学家的思想逻辑和学术功力。日本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由于很多局

限性而显得迷蒙混沌,此文如同一扇打开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世界的绚丽和迷人。

《近畿地区的神社》论述的问题与神道文化密切相关。日本神道文化的历史悠久,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畿地区古来的神社众多,加茂地区日枝神社的缘起使人联想到《古事记》中美丽的传说,御影社(小野神社)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作为遣隋使而闻名的小野妹子那个时代。更多的神社在没有历史记载时期已经出现,其历经沧桑,历史的积淀极为厚重,凭靠神社研究可以探寻到日本古老历史的秘处。历史总是充满诡谲,扑朔迷离,有太多的谜团留待史学家去破解。平野神社的今木神、久度神、古开神和比咩神究竟是何方神明?寻常可见的兵主神社的祭神又来自何方?这些问题历来虽不乏索解者,但迄无确解。历史文献的翻检往往是历史学家唯一可借助的手段,但又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尤其是在年代久远,文字记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有时会让人枯坐镇日,寥无所获。而本文的作者以其深厚的史学蕴蓄,把问题置于民族、民俗、社会、宗教等多学科融为一体的语境中去思索、辨析,从而言之有理、顺理成章地化解了这些谜团。其所持之论虽然仍属“异部名字难必和会”,但或许也可说“虽不中,不远矣”了。

《圣德太子》以简约的线条勾勒出一位日本民族奉为圣人的形象。圣德太子,一代英才,文韬武略,政治上高瞻远瞩,锐意进取,其制定的冠位十二阶与《十七条宪法》,为古代日本律令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外交上圣德太子视野开阔,纵横捭阖,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他热心吸收中国文化,向中国派出遣隋使,“日出之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小野妹子那封著名的国书更是开了国际关系中

对等外交的历史先河。“唯佛是真”是圣德太子始终不渝的信念，他以满腔热情致力于引导人心向善，为佛教在东土弘扬做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圣德太子勤于思辨，学殖深厚，文采出众，《十七条宪法》和佛学经典《三经义疏》都出自他的笔下。圣德太子的卓越在日本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弘法大师的文学艺术》使我们对这位平安时代的文化人物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建树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弘法大师所编撰的《文镜秘府论》使读者得以窥见、领略中国盛唐时期的诗歌创作，其所引用、保留下来的文献在今日中国大都已亡佚，这就使该著述更显得弥足珍贵。与弘法大师的书法一样，《文镜秘府论》是大师留给后世的又一份文化遗产。《平安时代的汉文学》论述的是汉文学对日本国文学的影响，不言而喻，汉文学的影响远远逾越了文学领域。这一时期，来自东瀛的留学僧们不仅学习汉文学，他们热心专注于一切文化门类的学习，其中也包括音韵学。中国的音韵学受到印度梵语学的影响，在唐代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守温三十六字母”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留学僧们写汉语、作汉诗，自然也学习到了中国的音韵学，日语五十音的辨别和划定就始于这些留学僧中间。五十音的辨别和划定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汉文学的影响，其奠定了日本语发展的基础，凝聚了一代遣唐留学僧的智慧，是惠泽整个日本民族的文化创造。

《关于应仁之乱》截取的是一个历史的断面，在日本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所谓下剋上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底阶层打破了一切旧有秩序，皇族贵族阶层日渐式微，下级武士成为社会的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平民力量的兴起，文化开

始走向大众,被视为贵族学问的汉学走出象牙之塔,成为了大众的学问,对神的信仰、天子宗庙的信仰变成大众的信仰,日本人的尊王观念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或趋向稳定的。这对于国民思想的统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了日本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文章夹叙夹议,对应仁之乱的历史娓娓道来。《樵谈治要》和《尘塚物语》片断的契入更是引人入胜,令人似乎感受到那段鲜活的历史触手可及。《樵谈治要》是一条兼良对将军义尚所论治国理政之书,其所述经纶实乃老生常谈,不足为道,但却真实记录了应仁之乱实态和作者亲历感受。《尘塚物语》所录山名宗全的趣闻逸事似令人发噱,而实为针砭时事,讥弹世态,发人深省。所谓应仁动乱十年,实不过三四年而已,大乱大治,继而便是盛世,日后日本的社会发展与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作者看来,所谓历史就是一部底层民众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应仁之乱对于理解日本至为重要乃在于此。

文化的比较不能不涉及社会政治,日本古代社会律令仿效的是唐代制度,唐代制度的引进给日本社会文化打下了深深的印痕,但它的引进绝非简单的依样画瓢,从《唐代文化与天平文化》的论述可以知道,天平时代律令的引进是一次去芜存精、取吾所用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在日本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事实上,如果对日本社会文化生活细加观察的话,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今随处历然可见,但是我们难以发现那些历史的糟粕夹杂其间。作为日本文化的他者,中国文化在文中只是一个参照,但如果能在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的审视中发现我们文化中负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或许以往被我们忽略,甚至从未意识到,那么此篇的阅读就更

平添了几分意义。

《大阪的町人与学问》描绘出的是一个城市文明史的略图。大阪是日本最早的商业都市。早在其开埠之时，文化的创造活动就已经出现。散人如竹的《四书》标注、西村天因的宋学奠基之作都是在大阪完成的，他们的劳作推动了江户时代汉学的复兴。铁眼和尚的《藏经》刊行更是为日本佛教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大阪的文化勃兴还是在元禄时代以后，这是日本文化的成熟时期。大阪距京都咫尺之遥，净琉璃、演剧（芝居）、音曲等艺术都传自京都，千年古都的王朝文化一直沾溉着这座商业都市。但令人惊叹的是，大阪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大阪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的兴盛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趣，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净琉璃、歌舞伎、浮世草子等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化消费的主流。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在大阪竹本剧场连演三年，盛况不衰，井原西鹤的情色文学作品成为流行。他们的作品应时代潮流之运而生，是时代造就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江户文学史上的并峙双峰。富永仲基、片山蟠桃、桥本宗吉的名字在日本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留下令后人仰慕的辉煌业绩，他们也都是从大阪这块土地走出来的。如果说江户文化渗透着幕府政治的影响，京都文化散发着皇家贵族气息，那么大阪文化就带着浓厚的平民色彩。大阪距江户遥远，中央政权的控制和影响相对薄弱，文化氛围也更为宽松，在这时期，阳春白雪的和歌开始被大阪的平民吟唱所替代，公卿贵族的蹴鞠成为大众的娱乐，学术文化如国学、汉学研究也呈现出平民化倾向。怀德堂的出现更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其施行的平民教育方针和兼容并包的学术理念具有开创性意义，也在日本文化

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永久的丰碑。

《关于香料的原产地》是别具一格的篇什。作者在尘埋网结、浩如烟海的历史笔记、地理资料中爬罗剔抉，广征博引，细密考辨，匡正了香道史上已成定识的纰误。香道是日本文化的一枝奇葩，其历史与佛教密切相连，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日本的最初时期。随着15、16世纪日本同南洋地区贸易的拓展，各种新的香料传入日本，促进了香道的发展，也大大地开阔了日本人的知识视野。作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博物学极其昌盛的时代，在其对香名、香料产地考辨的过程中，我们分享到的是令我们耳目一新的博物学知识，也勾起我们对那悠久而典雅的香道历史的无限遐思。

《日本国民的素质》细致有条地论述了从镰仓时代到足利时代那段日本历史黑暗时期文化的境遇。日本传统的神道在这一段时期几近完整地形成，并且被赋予了哲学上的意义，日本也开始拥有了以自己国家的历史作为出发点的哲学。歌学是建筑在国语基础上的，和歌的传授虽然由一条、冷泉家垄断，有繁杂的清规戒律，但其使国语具有了权威性，国语的权威性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源氏物语》在这一时期备受推崇，被视为天下第一要书，歌学史上细川幽斋与门人宫本孝庸的那段著名对话使这部小说带有了几分“半部论语知天下”的意味。如同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源氏物语》当然有各种解读方式，但最根本的一点是，透过这部看似描写淫乱的男女关系的小说可以看到日本人率真的品性及深邃的社会意义。在日本历史上的黑暗时期，纵然兵燹战乱，日本人竭尽全力，甚至有人不惜生命去保护那些来之不易的外来文化成果和传统的歌道、书道、神道、物语等，并不断有

所创造,传统的文化得以薪尽火传,体现了一个民族对传统文化的珍视,这样的民族无疑是具有文化素质的民族。《日本文化的独立与普通教育》从教科书的变迁论证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堪称蹊径另辟,匠心独运。教科书是社会历史文化知识的载体,其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出的是市井生活、人间百态,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教科书摆脱完全使用中国输入的书本,从字书的逐渐演变到往来物读本的出现和普及,日本的教育从最初的公家(贵族)发展、普及到庶民阶层,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终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心智的成熟和文化的独立。

内藤湖南学术兴趣极其广泛,涉猎的研究领域众多,他曾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绘画史讲座多年,所著的《中国绘画史》不仅在日本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被介绍到中国。收入本书的《日本肖像画与镰仓时代》是一篇关于日本肖像画演变史的专论。对于日本绘画史研究而言,肖像画是个难以把握的画种,风格繁多,不易分类,脉络复杂,难以梳理。内藤湖南运用实例如《圣德太子像》与五祖像、神护寺所藏画像、豪信的肖像画集等,从笔法、设色到服饰、人物表情、风采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勾画出一个历史时期内肖像画的创作特色。日本肖像画在保持数百年唐代风格之后,在藤原时代开始出现用新颖手法创作的肖像画作,固有的肖像画风格为之一变,以藤原隆信为代表的肖像画开创了日本肖像画的新时代。从镰仓时代至南北朝时期的肖像画极具日本特色,这是日本肖像画的全盛时期。而进入室町时代中期,即便也不乏有诸如狩野派之类的肖像画佳作问世,但就整体而言,肖像画已过了其鼎盛时期。传统的观点认为,现存肖像画最多的室町时代为肖像画的



全盛时期，内藤湖南不仅以令人信服的精辟论述推翻了这一陈陈相因的传统观点，而且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厘清了日本肖像画与禅宗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内藤湖南对肖像画演变的考察是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任何一门艺术，其创作手法、风格的变化都是与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的。内藤湖南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洞察到藤原时代末至镰仓时代初、中期，日本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各社会阶层的变化，新的思想、新的宗教如净土、真宗、日莲宗的产生，文化艺术领域内除旧图新、追求独创的精神开始孕育和不断发展，肖像画的兴盛是恰逢其时。

《关于日本南画的鉴赏》从美术鉴赏的角度通过对各个不同时期代表性画家如大雅堂(池大雅)、祇园南海、与谢芜村、野吕介石、田能村竹田、中林竹洞、渡边华山等人的创作分析，论述了日本南画的渊源流变。不同于大和绘和浮世绘，日本的南画是在中国文人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文人画的历史久远，到宋元时期文人画已日臻成熟，至明代已成为当时的主流画派，并直接影响到清代绘图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其表现出的是最传统的中国文化特色。文人画清雅淡逸，多为文人雅士信笔遣兴而作，不仅讲究笔墨技巧，更追求一种神韵，画面营造的意境往往透露出画家的某种精神寄托或感情抒发，如董其昌所云：“以画为寄，以画为乐。”<sup>15</sup> 15世纪中叶即室町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应仁之乱就发生于这一时期，但这一时期日本传统的文化如能乐、花道、茶道、连歌、庭院艺术等仍得以灿烂绽放。也就在这一时期，大量的中国绘画传入日本，受中国宋元绘画的影响，在禅宗文化的背景下，水墨